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中方专家组介绍有关情况

自然宿主有多种潜在可能 国外或早有传播未被发现

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一直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3月30日正式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外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3个工作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对新冠病毒引入人类4种传播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定性风险评估，并用“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5个层级评价。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

报告发布的第二天，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本次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的有关情况作进一步介绍。

羊城晚报驻京记者 王莉

1 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事故引入

清华大学教授、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会上介绍，联合专家组对四种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事故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表示，本次溯源工作，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鼬科、猫科动物以及其他的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

针对有外国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野生动物的观点，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联合专家组动物与环境组中方组长童贻刚表示，中国科学家对南方的蝙蝠等动物做了深入研究，曾找到过和新冠病毒非常接近的病毒，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支持中国南方有病毒传播链的假设的确凿科学证据。

2 中国家畜家禽等采样未发现病毒

梁万年介绍，联合专家组对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采样监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

在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的环境取样显示，环境中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其中水产摊位尤为明显，提示这个市场存在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动物和动物制品引入病毒的可能。对该市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

童贻刚进一步表示，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制品样品，以及2018年到2020年期间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采集到的38000多份家畜家禽样品以及41000多份野生动物样品进行检测，都没有检测到阳性的结果；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后，也没有发现新冠病毒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中传播的证据。

“对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上游供应链，我们也进行了全面排查，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进行彻底调查，需要各个国家在世卫组织的统一协调下，开展更多的溯源研究工作。”童贻刚表示，下一阶段要在全球溯源的框架下，全面细致地进行多种动物的调查和溯源。

3 “中国没提供原始数据”的假设不成立

针对“中国没提供病毒溯源原始数据、推迟发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等外媒记者的提问，梁万年表示，所谓“中国没提供病毒溯源原始数据”的假设不成立，病毒溯源中外专家掌握信息不存在差异。对于资料供给，要进行不同专家的不同领域进行分析，中外双方专家一直高度融合研究。不是中方研究中方的、外方研究外方的。有些数据按照中国法律，是不能带走或拍照的，但是在武汉的分析都是一起做的。

针对外界质疑联合研究报告推迟发布和数据完整性问题，梁万年回应，只有中外双方联合专家组共同认可报告才能发布，并未对报告发布预设时间，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推迟发布，而所谓的数据完整性，是要有边界的。目前报告的结论是基于已经掌握的数据，和科学家们的科学知识，以及推理、推论形成的。

4 国际专家去了所有想去的地方了解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会上介绍，经过近两个月的共同努力，联合专家组就此次联合溯源工作的研究方法、主要发现、科学假说及下一步建议的主要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米锋介绍，此次溯源工作，世卫国际专家去了所有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等9家单位；也见了所有想见的人，比如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商户、当时的志愿者、康复的患者以及一些牺牲医务人员的家属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针对记者提出“有媒体称中国给世卫专家组施加压力”的说法，梁万年表示，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与联合专家组的感受不一样。

梁万年表示，即使离开武汉后，专家们还经常通过视频讨论，私下交流时也没有人表示过自己在中国做科学研究工作时受到了压力。外方专家回国后也分别接受过当地媒体的采访，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这次溯源研究的过程、成果，没有发现他们受过干扰，相反，他们曾经指出个别媒体的报道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不一样。

5 其他国家有疑似阳性样本发现早于武汉

报告显示，联合专家组评估了不同国家已发表的研究数据，这些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播一般先于当地最初发现病例数周。其他国家有疑似阳性样本发现时间甚至早于武汉首例病例，这表明在其他国家有传播未被发现的可能性。

梁万年表示，溯源就是要找到零号病例，武汉这次首次报告的病例，是首次发现的病例，并不意味着就是溯源上追寻的零号病例。“如果仅仅理解溯源就只是在中国做工作的话，这是科学上的一个误区。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溯源视角必须更广泛。”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联合专家组分子生物组中方组长杨运桂介绍，基于分子溯源工作，联合专家组达成一致，在全球框架下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建立一个整合全球所有新冠基因组的整合数据库，包括基因组序列、流行病、宏基因组以及环境等相关数据；二是在测序深度和测序平台之间提出指南性建议；三是通过文献的梳理，专家组也认同比武汉更早的国外序列样本的存在，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跟踪早期全球的病例样本；四是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物种的筛查。

一图读懂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联合专家组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3个工作组，对新冠病毒引入人类4种传播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定性风险评估，并用“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5个层级评价

传播途径

“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事件传人

“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

极不可能 | 不可能 | 可能 | 比较可能 | 非常可能

“可能至比较可能”从原始动物宿主直接传人

“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

已有证据显示，与新冠病毒最相近的冠状病毒存在于蝙蝠和穿山甲体内，表明这两种哺乳动物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但病毒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表明可能还有其他动物是潜在宿主

疫情源头

●在2019年10月至11月期间，武汉不太可能发生新冠病毒“实质性传播”

●相关证据可能表明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最初源头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播一般先于当地最初发现病例数周

●其他国家有疑似阳性样本发现时间甚至早于武汉首例病例，表明在其他国家有传播未被发现的可能性

传播链条

●对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采样监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

●截至华南海鲜市场关闭时的环境采样分析显示，病毒的环境污染广泛存在，与新冠病毒有可能通过污染产品传播至人类的结论相一致。华南海鲜市场的供应链包括来自20个国家的冷链产品和动物产品，其中一些国家在2019年底前的样本新冠检测呈阳性，还有一些国家存在新冠病毒的近亲病毒

本版制图/刘栩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到202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县城逐渐成为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和返乡农民工安家定居的首选地。在此背景下，3月29日，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拟对县城新建住宅的高度进行限制，以6层为主，最高不超过18层，6层及以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75%。

《意见稿》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县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县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仍然存在县城规模无序扩张、布局不合理、密度和强度过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能力不足、人居环境质量不高等问题，迫切需要转变县城开发建设方式，推进县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意见稿》提出，严格落实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有关要求。其中包括：控制县城建设密度和强度，县城人口密度应控制在每平方公里0.6万至1万人，县城建成区的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应控制在0.6至0.8。

限制县城居住建筑高度，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75%。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确需建设18层以上居住建筑的，应严格充分论证，并加强消防应急、市政配套设施等建设。

《意见稿》还明确，县城建设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建设绿色节约型基础设施，加强县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设畅通的步行系统，营造人性化公共环境，推行以街区为单元的统筹建设方式等。

讨论

县城消防能力较难实现高层救援

根据《意见稿》透露的信息，住建部拟限制县城新建住宅的高度是出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考虑。但记者了解到，县城消防救援能力较弱、城区空心化等问题也是影响该措施的重要原因。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50米以上的建筑属于一类高层，大部分消防车能够到达54米，以3米一层计算的话，也即能够抬升到18层楼高。而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地形、周边设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实际抬升高度进一步下降。

此外，很多高层建筑的消防设施并不完备，也增加了高层消防应急的难度。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上半年，全国23.5万幢高层住宅建筑中，未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占46.2%，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高层建筑平均完好率不足50%。

“对县城来说，消防车高度、设备配备能力、救援能力等可能难以达到高层救援的要求。”上述人士表示。

部分城市高层建筑空置率较高

给县城住宅高度戴上“紧箍咒”，与当地劳动力不断流出、楼市疲软有关。金茂地产东莞公司投资部刘冠宏表示，从市场来看，弱县的空置率普遍较高，需求疲软，房地产开发几近停滞，但如昆山、常熟等经济“强县”则仍有一定需求。

“拿我们县来说，年轻人普遍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县城的人很少。”家住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的肖霖表示，从其居住县城来看，当地居民住宅以自建房为主，对高层住宅的购房需求较低，高层建筑空置率较高。

来自廉江市安铺镇的市民李先生则表示，近年来当地高层住宅需求较旺，房价涨势明显。“几年前县里主要还是以自建房为主，但是近几年商品房频繁问世，目前已有很多楼盘，并且整体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他说。

“过去县城的建设过于粗放，造成市场混乱，也影响了安全环保与居住舒适度，因此对于县城高层楼高的限制是有必要的。”有业内人士提出，对于没有人口支撑的县城确实应该严控，但是对于环京等承接一线城市溢出人口的县城则需要适度调整。

延伸

新政对县城楼价影响不大

新政如果实施是否会引发县城楼价的上涨？对此，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去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和租金的统计数据显示，县域房价和租金基本呈下跌趋势，大部分县城需求较为疲软，因此对房价来说影响不大。

“长期来看供应确实会有所下降，但考虑规划条件对起拍地价的影响，对房价的影响不大。”

“十四五期间，县域城镇化发展必然会提速，这也要求住房规划有新的内容。高层建筑虽然客观上可以解决更多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但是如果消费等配套不到位，会影响居住的舒适度。”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过去县城开发的强度过高，而相关基础设施尤其是消防方面的设施不到位，所以导致相关住宅项目楼层偏高、密度过大，影响了居住的舒适度。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许多开发商在县城开发高层建筑，以电梯房、洋房为噱头吸引购房者，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品质的提升和配套的完善，反而抬升了房价。大部分县城市场并没有达到供不应求的地步，因此“限高”并不会使房价波动，但会让房产价值得到提升。

“从高质量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来看，住房发展需要更加科学规范。以低层建筑为主，同时注重紧凑型的城市建设，能够真正让县域住房发展和当地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符合高质量人居发展的导向。”严跃进表示。

开发商应注意后续产品规划

“高层建筑公摊大、建筑成本高、支出成本大，后期维护成本高，不符合未来需求。”李宇嘉认为，该政策可以避免开发商贪大求洋，盲目鼓吹和炒作，抄袭大城市商品房开发模式，增加建筑和维护成本，不符合农业转移人口和返乡农民工居住为主、对人居软环境要求较高的需求、对成本敏感的现实情况。

李宇嘉表示，在县城住房存量较大的情况下，政策从供给侧着手，增加县城住房有效供应，降低供应成本。同时，也降低未来可能出现的库存挤压，争取让供需能够匹配。

据了解，在新的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城镇化的主体是农业转移人口和返乡农民工，降低县域城镇化的建设成本、安居成本成为当务之急。

“出台此类政策能够约束高层建筑的开发，将县城绿色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筑规划等进行更好地协调。”严跃进表示，该政策有助于限制房地产过度开发，约束企业理性对待住宅开发。对于房企来说，后续产品规划尤其需要注意在消防设施等配套方面的导入，以更好地符合当地的城乡和住房发展规划要求，真正促进住房建设科学、生态、宜居。